

可以成为贵族之家,两者可谓大相径庭。尽管如此,当时的人们热心于成为贵族一事,由此可见一斑。至少到初唐、盛唐时期,评判族望高低的总谱还是在编撰的。

再看唐代的民政。六朝时期,民众处于各地的望族管理之下,而到隋唐时期,则完全接受国家的统一支配。唐朝依据乡、里、邻制度将民户按户组织,使其成为中央直接统治的对象。可是据唐户令,在实施里制的同时,在都市另有坊制,在乡村则有村制。坊制是六朝时期的产物,而村制更可以说是在六朝时期新出现的农村。唐朝不能单靠里制来掌握民众,在另一方面它还不得不承认这些自治聚落的存在。

如上所见,统一了全国的唐王朝把周围的各个部族纳入州县制之中,并且还试图全盘掌握贵族和人民。但是这一企图无法得到贯彻,在现实中面对六朝以来的独立倾向,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妥协。值得注意的是,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自立势力由此得以保存,到唐代中期以后进一步发展,在唐宋变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是四周的部族,如契丹族在彻底摆脱羁绊以后,兴建辽国,走向了独立国家之路。再如以村为中心形成的草市则成为市、镇这样一些地方都市形成的基础,同时也促成了货币

经济的盛行。拿考核唐代士人人格的科举制度来说,内藤湖南认为从唐代到宋代以后,科举制的发展反映出了从人格主义向实务主义的变化。不过,虽说是实务主义,但并非单指行政上的实务能力,而是考核基于学问和教养的政治见识。在这种标准下选拔出来的官僚群规模庞大,成为君主独裁政治的执行人,由此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举制时代。

总之,魏晋以来的历史潮流到隋唐时期产生出各种各样的制度,虽然这股潮流的生气在慢慢衰竭,但在那些制度的内部又再次迸发出新的潮流。与从前的时代相比较,魏晋至隋唐的历史发展看似在倒退,其实反映了历史运动的潮流在这一阶段转变了方向。在人格主义、普遍主义理念的诞生这一点上,可以说将中国史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收稿日期】 2004-11-26

【作者简介】 谷川道雄(1925—),男,日本熊本县人,历任京都大学、龙谷大学教授,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中古史。

唐宋时期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

王永平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037)

唐宋时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但是,唐、宋社会的文化面貌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早注意到这种不同时代特色的学者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先生,他在上世纪初首倡“唐宋变革”说,他从文化史观的角度出发,提出唐宋在学术文化等领域发生了质的变化,“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唐末五代是“一段过渡时期”。内藤提出的所谓“中世”相当于封建时代,“近世”可以理解为“接近于资本主义的时代”,他把宋以后的社会和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看做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因此他认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显著的差异,甚至“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胡戟等:《二十世纪唐研究》第21、3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种观点提出以后,在国际汉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后来“唐宋变革”论(或曰“唐宋社会变迁”说)的滥觞,由此还引发了关于唐宋社会性质的热烈讨论。后来诸多持“唐宋文化变迁”说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内藤学说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傅乐成先生又提出有关“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看法。他认为唐、宋各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前者兼容并蓄,外来文化激荡较多,文化精神较为开放活泼;但在安史之乱后,逐渐回归中国文化本位,儒学复兴。因此宋代

可称为中国近世本位化之建立期。(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国立编译馆馆刊》1972年第1卷第4期)综观诸论,大都肯定唐宋之际中国文化发生了重大变迁,但需要指出的是,唐宋文化的这种变迁还不能真正称得上是文化类型或文化模式上的根本转变,因为从本质上而言,文化类型或文化模式的转换,应该取决于这种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转变。从这一点上来说,唐宋社会尚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还不具备文化类型或文化模式根本转变的社会环境。由此看来,唐宋文化的变迁与其说是文化类型与文化模式的转换,毋宁说是中古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更为贴切。

一 唐宋文化的不同时代特色

唐宋时期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从许多方面反映出来,其中唐宋文化的不同时代特色表现得尤为明显。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从文化气派和文化精神上来说,唐、宋文化面貌具有很大的差异。文化气派和文化精神是一个时代文化积淀的反映,也是一个时代文化面貌的最重要的体现。唐文化气度恢宏、高昂壮丽,具有史诗般浪漫的文化气质,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宏

大气派。这一时期,随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巩固和发展,社会经济高度繁荣,国力强盛,中华民族的自信心空前高涨。社会上普遍奔涌着昂扬奋发的意识,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具有一种高亢、明亮的时代特色。开放的唐代社会,其文化精神颇有可足称道者,开明宽松的文化氛围、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丰腴富丽的独特风格,最能体现这一时期高昂壮阔的时代精神。宋文化则始终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忧患意识,透露出理性般深沉的文化气质,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经世观念极强的时代风貌。两宋时期虽然创造出了中古时期最为先进、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却是中古史上著名的“积贫积弱”时期。这种表面上的社会繁荣与现实中的内忧外患互为表里,就形成了宋文化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宋文化还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创新意识,这种创新意识具有浓厚的理性精神与人文精神,预示着中国的封建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局部更新和“丕变”过程,形成了宋文化“变古”的时代特征。

2. 从文化成就上而言,唐、宋虽然同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辉煌灿烂时期,但是它们所取得的文化成就,无论从内涵上,还是从深度、广度上,都是各有千秋的。唐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阶段性集大成时期,也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32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唐文化总结和继承了汉魏南北朝以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又吸收了当时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精华,造就了这一时期文化领域内各部门的大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高峰。宋文化是中古文化全面成熟、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鼎盛期。陈寅恪先生在论述中国文化时曾经提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77页)的确如此,中国文化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精细,在许多领域都达到极盛,可以说宋文化是中古文化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篇章。

3. 从文化创造的风格上来说,唐、宋两朝也具有明显的不同。唐文化风格高亢、明朗、热烈、奔放,宋文化淡雅、舒缓、精致、细腻,这种不同风格的文化创造的出现,主要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由此造成了文化创造的时代氛围也颇不相同而产生的。唐文化创造的时代氛围相对宽松,少有禁忌,言论著述和思想信仰有较多的自由,政府也鼓励文化创作的多途发展,这就形成了唐代文化生动活泼的发展局面。宋代则不然,随着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加强,政府对于文化的强力干预政策也较过去有所增强,文化创造中的禁区也日益增多,人们害怕动辄得咎,因而对于现实社会的揭露与抨击越来越少,歌颂明显胜于暴露,“资治”与“经世”意识极为浓厚,这就形成了宋代文化精致与内省趋势的发展局面。在这种不同的社会氛围之下,唐、宋文化创造的风格自然

也就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唐人在文化创造的过程中,注重直观体验,直抒胸臆,富于浪漫气息和理想色彩;宋人则注重内心感受,委婉深沉,感情细腻真挚。这种不同的文化创造风格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这说明唐宋文化面貌的确发生了局部变化。

4. 从文化人的时代气质上而言,唐、宋两朝也具有显著的差别。唐代是在经过魏晋南北朝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胡汉一体的大一统王朝,由于受少数民族风气的影响,唐人“大有胡气”,尚武豪放,“出将入相”、才兼文武成为当时的社会风尚。受此风气的影响,唐代文人知识分子普遍具有一股劲健豪侠之气,他们突破了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观念,纷纷投笔从戎,希望通过建功立业来实现平生的理想与抱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便喊出了这一时期一代文人的心声。另外,由于唐代文网的宽疏和文禁的松弛,使唐代士人普遍具有一股傲岸自负的狂狷气质。这种气质使得唐代士人充满了文化创造的活力,他们积极探索创作道路的多样性,在文化创作时往往能够直抒胸臆,毫无扭捏猥琐之态,“他们的文化创作因而充满着自然真挚的美与清新纯真的气息”(林正根:《论纳异心态与唐代气魄》,《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宋代是在经过唐末五代的分裂割据局面之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统治者鉴于藩镇割据与军人跋扈的历史教训,确立了“兴文教”、“抑武事”的基本国策,在分割军权、压抑武人政治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教育和科举制度,广泛吸收文人知识分子参加政权,逐步确立起了文人当政的文官制度。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提高,“重文轻武”逐渐成为社会风尚。宋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和追求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万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诱惑,整个社会普遍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认识,走科举入仕成为宋代文人知识分子实现人生价值的最高理想;而武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则越来越低,以致后来出现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嫁当兵郎”这样的民谚。如此的时代文化氛围,使得宋代与前代相比,文人意识更为自觉,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也因此渗透着更为强烈的文人气息,他们创造出来的宋代主流文化(如理学、诗、词、文、赋、书、画甚至文人生活等)呈现出浓郁的精致、高雅、含蓄、内省的审美趋势。

以上所论及的唐、宋文化的不同时代特色只是从总的方面而言的,其实具体到文化领域内的各个部门来说,这种差异和区别还是颇不易界定的,因为说到底宋文化毕竟还是在继承前代已取得的文化成就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不过,宋文化不是简单地继承前代已有的文化成果,更不是前朝文化的余绪,而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发生了量变过程中的局部质变,从而使得唐、宋两个朝代的文化显示出了某些阶段性的特点。

二 唐宋文化面貌局部更新的时代背景

唐宋时期文化面貌发生局部更新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这主要是由于唐宋之际所发生的社会巨变所造成的。唐宋时期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步入后期的重要转折阶段,从中唐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自然、社会、历史等综合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宋社会面貌因此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从而引发了文化领域内的局部更新。

关于唐宋之际的社会巨变,学术界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所发生的新变化去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从中唐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地主土地所有制排挤了均田制,两税法代替了租庸调,这标志着中国封建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到北宋建立以后,统治者采取了“不抑兼并”和“田制不立”的政策,更是促进了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而“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是决定当时社会面貌的主要因素”(胡如雷:《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巨大变革》,《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第3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政治、军事格局上而言,安史之乱以后,强盛的大一统的封建国家遭到了严重破坏,形成了藩镇割据和军人跋扈的残破局面。北宋建立以后,虽然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但从实际意义上讲,北宋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无法重现汉、唐盛世时期的规模;而且北宋初年所进行的政治、军事方面的改革,尽管结束了军人当政、骄横跋扈的局面,建立了以文人为主体的文官制度,但却形成了“重文轻武”的社会风尚,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积贫积弱局面。这种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的新变化成为唐宋文化面貌发生局部更新的时代土壤。

另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唐宋时期所处的历史地理环境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对于唐宋时期文化面貌的变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从疆域上来说,唐代是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尤其是唐前期疆域辽阔,其势力极盛时超过西汉,东至朝鲜半岛,西至中亚细亚,北至西伯利亚,南至印度支那。而北宋的统一只是相对的,仅仅统一了中原和南方地区,另外还有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与之并立,其中主要是契丹族建立的辽和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北宋的疆域面积大大缩小,不及汉、唐盛时之一半,甚至还比不上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的疆域辽阔。到南宋时,女真族建立的金朝入主中原,南宋只好偏安江南。这种变化对唐宋文化面貌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空前辽阔的疆域和强盛的大一统帝国为唐人提供了壮阔的历史舞台,使他们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时代豪迈感,激发了他们进行文化创造的活力。而宋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思想也与这一时期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和农耕民族所受到的长期困扰不无关系。

第二,从交通上来说,唐代除了有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外,还有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等。由于对外交流孔道的空前畅通,唐文化以一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融合和吸收了国内外各地域和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经过一番消化、改造和淘汰的过程,挾取了其中的有机成分,锻铸成了一种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开放型文化。宋以后随着政治、经

济和军事形势的新变化,对外交流的主要孔道也发生了重要的变迁,中原王朝与西域进行联系的丝绸之路被阻塞,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兴起并迅速发展,最终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这种变化对唐宋文化面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宋以后由于对外交流孔道的单一,加之农耕民族视航海为险途的狭隘认识,使得宋代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对封闭、内敛的文化机制。

第三,从民族上来说,唐代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唐皇室以胡汉混杂的血统奄有天下,不仅受容和化解了南北朝以来的各“胡”族,而且彻底打败了北方和西北方的强邻突厥,有效地实施了对西域和漠北的控制与管理,雄踞雪域高原的吐蕃与唐结成“甥舅之好”,南诏、回纥、渤海等少数民族政权则与唐保持了友好关系,形成了各民族“和同为一家人”的盛大态势。唐王朝还以博大的胸怀和多样化的怀柔羁縻手段,使各民族纷纷归附,唐天子不仅是汉人的皇帝,而且被“诸蕃君长”尊为“天可汗”,成为各族的共主。各民族融合和交流的趋势大大增强,从而形成各民族共同创造唐文化的局面。宋代则长期受到契丹、党项、女真以及蒙古诸族的困扰,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与对垒在这一时期表现得异常地尖锐、激烈,由此产生了宋人浓重的忧患意识并渗透到宋文化的各个层面。

第四,从人口上来说,唐代人口极盛时有六七千万,而宋代人口极盛时已突破1亿。考虑到宋代的疆域面积要远远小于盛唐,那么这个人口数字的增加则是非常惊人的。在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是和人力投入成正比的,宋代与唐代相比,在疆域面积大大缩小、人口却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意味着宋代拥有远远超过唐代的庞大的劳动生产力,这就使得宋代在单位面积产量的人力投入上大大超过唐代,这也是宋代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唐代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文化的繁荣得益于经济的发展,宋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古文化全面成熟、大放异彩的重要时期,是和宋代经济发展水平的空前提分不开的。另外,随着唐中期以来南方经济的发展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两宋时期南方人口大大超过北方,这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此引起了全国学术文化中心的南移。

第五,从气候上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气候温暖期,而两宋则为气候寒冷期。气候的变迁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发展往往产生巨大的影响,气候的和暖,使无霜期延长,非常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与发育,同时也使农耕分界线发生明显的北移,反之亦然。有的学者指出:“气候的干湿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极大,一般说来,气温每降低1℃,亚热带北界位置也随着向南推移一个纬度左右,适宜于农作物生长的北界位置也随着南移。”(余同元:《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的时空差异性及其影响》,《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有人甚至得出结论:“气候温暖时期,中国北方游牧政权与中原农耕世界和平共处;气候寒冷时期,游牧民族南迁,中原王朝不稳,二者对峙,甚至建

立了“牧者王朝”；隋唐时期，由于气候和暖，致使“隋唐时代为北方游牧民族南进的间歇期”。（王会昌：《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地理科学》1996年第3期）唐代的农耕区域也在西汉时期的基础上大大往北推移，出现了相当广大的半农半牧地区，这些地区的变迁对王朝的盛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史念海：《隋唐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唐代历史地理研究》第250～27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而两宋时期，随着气候的转冷，农耕区域往南大大推移，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也日益剧烈，北方游牧民族大举南进，压迫农耕民族纷纷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中国文化、文化中心的南移。

此外，一些局部地区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对唐宋文化的变迁产生过较大影响。隋唐以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地区，两宋以后迁移到南方的长江流域地区，这和北方黄河流域地区的破坏有很大的关系。比如黄河的泛滥一直是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但唐代黄河处于安流期内，虽然也有河患，但大多限于较小的地区，并没有形成较大的影响，这样才使其南北两侧的地区能更多地发挥它们的富庶效益。所以，唐代尤其是唐前期，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地

区。到五代和两宋时期，黄河频繁泛滥，传统的北方黄河流域经济富庶区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由此引发了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全面南移。可见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至为深远的。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系列明显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除了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历史地理环境等综合条件所发生的变化外，唐宋之际的文化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迁。但是这些变化只是封建社会内部文化面貌上的局部更新，还难以称得上是文化类型与文化模式上的根本转变。因为从社会性质上看，唐、宋同处于中古封建社会，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不可能像近现代社会那样发生文化本质和文化类型上的根本转变。即使如此，唐宋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仍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伴随着中古封建社会的转折而表现出来，构成唐宋时代社会变迁的重要方面。

【收稿日期】 2004-12-06

【作者简介】 王永平（1966—），男，山西离石人，历史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史、隋唐五代史的研究。

文化与环境互动作用下的中古经济与地理变迁

王利华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若想公允地评估中古时代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和意义，我们的视野就不应局限于魏晋南北朝或者隋唐五代，而是应该尽量地“瞻前顾后”。如果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两者在地理格局、经济面貌、社会结构、典章制度、宗教哲学乃至民族气质等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乃是中古历史变迁的结果。如果站在更高的层面加以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古历史变迁并不是一个完全由社会自行决定的过程，不仅仅是社会内部一些现象衍生或者替代另一些现象，诸多生态环境因素亦曾参与其中，甚至发挥了重要的促发和驱动作用。因此，从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来认识中古历史变迁，也是十分必要的。以下仅对中古主要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动以及连带的社会地理格局的变化略陈浅见。

一 经济领域的主要变动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尽管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并不总是最凸显于经济方面，但经济变动无疑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与汉代相比，中古时代的经济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我们还应将南北的情况分

开来说。

先说北方。

两汉时期，中国基本经济区域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经济主体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旱作农业生产。在中古时代，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旱作农业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发生根本动摇，但是农牧经济的比重、畜牧业和种植业的内部构成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仅是社会性因素所致，而是具有不可忽视的生态动因。

中古时期，畜牧业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羊取代猪成为主要肉畜。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畜牧业复转衰退。上述这些变动，直接地说，既与游牧民族的内迁有关，亦与人口密度的升降有关；间接地说，则与气候的寒暖变化关系密切；而这三个方面又是互相联系的。

自东汉后期开始，气候逐渐向寒冷转变，驱迫游牧民族逐渐向南迁移，因为气候转冷不仅导致草原地区单位面积的牧草生产量下降，从而影响到载畜量和畜产品；而且寒冷期的酷寒事件比较频繁，导致牧群大量死亡，牧民